

主權外部性與幣緣戰略

——關於發展陷阱的案例研究

Sovereignty Externalities & Currency-strategy : Development Trap Case Studies

溫鐵軍 等（中國人民大學可持續發展高等研究院/西南大學鄉村建設學院）¹

摘要：本報告以全球化危機向發展中國家轉嫁為據，²提出兩個論點。其一，大多數發展中國家因“成本轉嫁”而沉落於發展主義陷阱的根本教訓，在於其在向殖民主義宗主國爭取國家“合法”獨立的交易中，已經形成了失去資源和經濟主權的負外部性。其二，當前金融資本時代強權政治控制的幣緣戰略不同于傳統的產業資本時代的地緣戰略，並且在以國家為單位的全球競爭框架中，客觀地形成了金融主導國家幣權為核心的“幣權三角”；由此衍生出國家競爭的微笑曲線，乃是製造業國家承擔金融化制度成本的內在機制。

這些理論創新，可以解釋包括中國在內的一般發展中國家的困境成因。

關鍵字：主權外部性 幣緣戰略 國家競爭 微笑曲線

本文把通過非暴力形式的政治談判這種“交易”來形成發展中國家獨立主權進程中與生俱來的制度性缺陷，稱為“主權外部性”；把金融資本階段憑藉政治強權維護世界儲備貨幣地位、並據此向能源和食物市場釋放過剩流動性，藉以把巨額債務轉化為他國通脹危機的“巧實力”運作，稱為“幣緣戰略”。

這兩者都是發展中國家難以改出發展陷阱的主要原因，也是金融全球化階段內在形成國家競爭的微笑曲線的前提條件。

¹ 本報告寫作和資料整理主要依靠研究團隊協作。其中，溫鐵軍提出理論觀點並對本文修改定稿；劉健芝組織團隊討論和翻譯；黃德興和薛翠起草本文草稿並做英文翻譯；所摘引之原稿中關於主權外部性見於 E7 比較研究報告，主要由黃德興在團隊討論基礎上承擔文字起草；關於幣緣戰略的原文為內部報告，主要有董筱丹和蘭永海起草；關於國家競爭的微笑曲線及其文字分析，由董筱丹在團隊討論的基礎上起草初稿。

² 溫鐵軍，全球資本化與制度性致貧，中國農業大學學報（社會科學版），2012（1）

一、發展中國家的主權外部性問題

由於，非暴力革命形成政治主權的發展中國家一般都在獲取政治主權的談判中因“資訊不對稱”而把經濟或資源主權讓渡給原宗主國或跨國資本；因此，這種以經濟讓步為代價形成的政治國家，其資源及貨幣等經濟主權方面具有內生的制度性缺陷，這就是“主權外部性”。據此可以解釋的現象是：很多發展中國家越是在上層建築方面努力符合西方要求，就越會因這種主權外部性難以化解而在經濟基礎領域深陷於“發展陷阱”不能自拔。

以下中國、南非和委內瑞拉的三個案例，可以作為本文提出主權外部性問題的經驗依據。

案例 1.1 中國的“土地革命紅利”：農民小資社會承載危機代價

如果認真觀察近代眾多民族獨立運動或民眾抗爭的歷史，很少有像中國那樣的經驗——通過發動占人口最多數的農民參加武裝革命取得相對完整的國家主權。這導致由革命戰爭建立起來的人民政府能夠在打碎舊國家機器的同時，徹底改變過去佔有絕大部分利益而向全社會直接轉嫁制度成本的、官僚資本和跨國資本相結合而構建起來的制度和法律；在沒收其一切財產的革命中，直接控制全部經濟資源並佔有收益。

這種無數貧苦農民流血犧牲換來的、作為大多數人民的後來者不必再向原所有者支付代價即可佔有財產的“強制性制度變遷”的制度收益，可以稱為不再發生國家主權負外部性的“革命紅利”。

中國在 1949 年革命成功後推行土地改革，全國有 85% 的農民獲益。幾乎每個貧苦農戶都分配到一小塊耕地，雖然人均耕地僅 1 畝多，但是卻使得中國大部分人口都擁有小量資產。所以 1970 年毛澤東會見美國記者斯諾時描述“中國是一個小資產階級的汪洋大海。”農戶所擁有的小塊耕地成為農民生存的最後保障。

據此可知，**中國通過土地革命所建立的，是世界最大的小資國家……**

不僅 1949 年土改，中國在城市開展工業化原始積累期間，每次遭遇經濟危機都重複著向農民平均分地的政治措施。例如：中國 1960 年遭遇蘇聯投資中輟和撤走技術援助帶來的城市產業資本危機，接著是 1961 年政府提出人民公社 60 條，其中主要政策是允許農民擁有以庭院地、自留地、拾邊地和小開荒等名義的土地權利；1980 年遭遇大規模引進西方資本轉化的國家債務危機，接著是 1981 年開始落實農民重新平均分配土地的“家庭承包制”；1997 年遭遇東亞金融危機，遂於 1998 年以“二輪承包”為名按人口重新平均分地並且明確農戶地權永遠不變……³

³ 溫鐵軍，《三農問題與制度變遷》序言，中國經濟出版社，2010 年第二版。



以上案例表明，如果看中國的產業資本原始積累及其形成完整產業、進入資本擴張之後的所謂高增長，一定程度上是在享受 1949 年的革命紅利——土地革命造成的最大小資社會及建於其上的制度基礎。

中國在土地革命之後的工業化原始積累時期形成了城鄉二元結構體制，具有“城市是資本池而農村是勞動力池”的特點，客觀上成為經濟學意義上的所謂“比較優勢”：

一是長期占人口絕大多數的農民幾乎百分之百擁有私人住房和土地，這使中國與其他國家之最大不同是有下層社會卻沒有絕對貧困人口，並且全國私人住宅擁有率達 89%，雖然高於美歐日發達國家但在農村卻並不計算為個人資產；儘管 1990 年代激進市場化改革以來城市大規模失業導致的貧困率增加、富裕人口財富占比和基尼係數標誌的貧富差別都顯著增加，但農村社會仍然相對穩定。

二是“農村勞動力池”在過剩勞動力趨向市場化定價的幾十年裡，長期、大量地向城市輸送“三低（低再生產成本、低對抗性、低社保成本）”的流動勞動力，儘管遭到多種不公正待遇且已經發生很多次勞資衝突，但內在具有東方農戶理性的中國農民打工者的大多數卻並未遵從西方 19 世紀階級政治的經驗和馬克思主義理論來開展工會運動；目前中國約有 2 億多農戶，農民外出打工者超過 2 億，只有這部分人完成在城市的定居之後，中國才完成農民打工者的工人階級化進程。

以上情況，也是近 20 年中國加入全球化雖然遭遇到兩次“輸入型經濟危機”卻都免於墮入發展陷阱的主要原因。

案例 1.2：南非的主權外部性及其制度化演變

1955 年，非洲國民大會 (ANC) 提出了自由憲章，明確主張土地分配，礦場、銀行和壟斷企業應屬全民所有，工業和貿易服務於人民的福祉，每個人都能享受免費教育、飲用水、電力、宜居的住房，以及工作權利等。這個具有民族民主革命宣言性質的自由憲章，一直是南非反種族隔離的鬥爭綱領。

但是，到了 90 年代初，白人政府和 ANC 談判，最終提出放棄種種政治特權的“交易”條件是黑人新政府要接受一系列體現新自由主義原則的經濟綱領，例如容許一個獨立不受制約的中央銀行，這等於閹割了政府對本國金融政策主導權；南非也要繼續溶入全球化，以不許補貼本國工業的不利條件加入 GATT (WTO 前身)，由此也無法創造就業增量；此外還接受了 IMF 的約束性貸款，壓抑工資，限制政府開支；在世界銀行的主導下，南非還得推動食用水和電力等公共服務部門的私營化。新政府還答應承擔種族隔離統治下白人政府背負的外債 (250 億美元)，理由是要維持投資者的信心。黑人民眾過去沒有從這些負債中享受到絲毫福利，現在卻要負責買單。

通過這種交易形成的主權具有嚴重負外部性。ANC 不僅沒有履行公有化礦產等自由憲章給出的承諾，反而為了償還每年 45 億美元的債務積極地私有化國家資產。同時，新政府維持親資本政策，放寬金融管制 (容許南非的大企業在海外上市，並把金融總部遷至海外)；由此使得南非經濟高度金融化，形成全球最泡沫化的房地產市場。2009 年，《經濟學人》評選南非為 17 個新興市場中最不穩定的一個。

1994 年 ANC 開始執政，由於僅有對於白人執政時期的議會政治的延續，而沒有掌握經濟資源主權，於是，南非農場和礦場土地大部分仍然由白人所擁有。**占人口約 14.1% 的白人擁有全國 87% 左右的土地**；而占總人口 74.8% 的黑人卻只有不到 13% 的土地。到了 2009 年，黑人擁有的礦場產權亦只有 8.9%。在 1990 年，南非白人農場平均每戶占地 1462.15 公頃，而在尚未宣佈獨立的 6 個黑人家園總人口為 701.3 萬，人口密度每平方公里高達 86 人，而土地總面積只有 883.8451 萬公頃，連城鎮、道路、河流、荒漠等都算在內也只有每人 1.26 公頃，只相當於白人人均佔有土地面積的 0.34%！⁴雖然南非政府計畫在 2014 年前，把白人農場主擁有的 8200 萬公頃的農地中的 30%，即約 2450 萬公頃，轉移給黑人農民。但到了 2012 年初，通過這項土地改革轉移的土地只有 670 萬公頃。

其結果是：

- 1994 至 2006 年，絕對貧困人口 (收入低於 1 美元一天) 從二百萬增加至四百萬，1995-2005 年間，黑人家庭收入平均減少了 1.8%，同期白人家庭卻增加了 40.5%；基尼係數從 1995 的 0.56 升至 2006 年的 0.73；2009 年南非的基尼係數仍達 63.1，是全球貧富差距第二高。

- 黑人的失業率高達 28% (實際數字更高，因為官方統計把行乞、靠打獵和種地為生

⁴ 孫紅旗著《土地問題與南非政治經濟》中央編譯出版社，2011，12-13。

都列為就業)；

- ANC 建造了 180 萬間低質素房屋(作為推動經濟的手段)，但同時有二百萬人失去居所；在 2006 年超過 4 分之一的人口居住在貧民窟；

- 在民主新政府第一個 10 年裡，一百萬人被驅趕離開農地；飲用水私營化改制之下，每年有 150 萬戶付不起水費被截停食水供應……

案例整理：黃德興

參閱：Naomi Klein *The Shock Doctrine*；《新興七國研究南非報告》 *South Africa Historical Review* www.emergingcountries.org

南非本來是殖民地型經濟，與 ANC 談判的白人政府本質上是後殖民主義代表，其種族隔離的內涵是“超級剝削”，所以反種族隔離的鬥爭本身必須包括黑人的經濟權力。1980 年代以前，南非的政策是典型的重商主義。黑人在白人政權和資本壓迫下飽受超級剝削。雖然後來黑人通過鬥爭獲得國家政權，但在這個交易之中 ANC 幾乎完全放棄了經濟主權，結果是不經過自由主義而直接進入新自由主義。雖然在政治上黑人擁有形式上平等的公民權(投票權、公民自由等)；然而在經濟層面，無形的種族隔離完全沒有改變。黑人政府掌握的，只是一個被掏空了經濟權力的政治空殼。在這種主權負外部性影響下，種族矛盾已經在黑人政權建立起來之後轉化為階級衝突。例如 2012 年 8 月 16 日南非東北部西北省的馬瑞康納 (Marikana) 白金礦區爆發嚴重流血衝突，鎮暴員警對手持砍刀和棍棒的示威礦工開火，導致礦工卅四人喪生、七十八人受傷。這是南非自一九九四年廢除「種族隔離政策」以來警方鎮暴行動造成最多傷亡的流血事件。

這種主權外部性問題，在發展中國家具有普遍性。

後殖民主義時期的發展中國家，也有通過具有民族民主革命性質的鬥爭重新收回經濟資源主權的案例。委內瑞拉就是其中的典型國家。

案例 1.3 委內瑞拉收回經濟資源主權的“查韋斯革命”

從資料上看，委內瑞拉曾經是拉美地區經濟較發達的國家之一（1960 年委內瑞拉人均收入高居全球第 18 位）；但，石油是國民經濟的主要支柱，石油資源的開發、貿易及其收益，主要是跨國公司控制。這與其他拉美資源經濟國家內生性具有主權負外部性的問題類似。

1、委內瑞拉連續遭遇危機和政權更迭

在 1970 年代的石油危機後，委內瑞拉人均收入下跌到 40 位。20 世紀 80 年代是拉美“失去的十年”，國際油價下跌使委內瑞拉出口收入銳減，外債激增，被迫放棄實行數十年之久的進口替代，轉向市場導向的外向型發展模式。到 1990 年人均收入下跌至全球 72 位。1990 年代改革過程中拉美經濟恢復增長，而委內瑞拉中下層民眾的生活水準急劇下降，貧富分化現象日趨嚴重，幾乎經歷了第二個“失去的十年”：1990 年代平均增長率僅為 2%，低於地

帶格式的: 字体: (默认) 宋体, (中文) 宋体, 五号, 加粗

區平均水準，失業率居高不下（見下表）；貧困率由 1990 年的 40% 上升為 1999 年的 49.4%。

	平均 GDP 增長		城市失業率（1991-2000 平均值）
	1981-1990	1991-2000	
阿根廷	-0.7	4.2	12.7
巴西	1.6	2.6	6.0
墨西哥	1.9	3.5	3.6
智利	3.0	6.6	7.5
哥倫比亞	3.7	2.6	12.5
秘魯	-1.2	4.2	8.7
委內瑞拉	-0.7	2	10.7
平均	1.2	3.3	7.4

表 2.26：拉美七國 GDP 增長率和城市失業率（%，1981-2000 年）

資料來源：CEPAL: Balance preliminar de las economías de América Latina y el Caribe 2000, Santiago de Chile, dic. 2000, P.85,89

1994 年受墨西哥金融危機的影響，委內瑞拉國內數十家銀行倒閉，引發了有史以來最嚴重的金融危機，經濟持續惡化。對此，政府採取緊縮開支、控制信貸、增加財政收入、調整物價、實施管制外匯等應急措施，使經濟連續三年負增長的局面得以緩解。但 1996 年 4 月政府宣佈了取消外匯管制、放開利率、提高汽油價格、增加稅收等新經濟措施，同時也制定了一些社會補償措施。新經濟措施頒佈後，國際貨幣基金組織、世界銀行、泛美開發銀行與委內瑞拉簽署了 33 億美元貸款的初步協定。2001 年底，受阿根廷金融危機的“探戈效應”影響，整個拉美在 2002 年陷入衰退（2001 年 GDP 增長率為 0.4%，2002 年為-0.4%）。如果說拉美國家是新自由主義的“受害者”的話，那麼委內瑞拉也許是受害較為嚴重的一個。

新自由主義改革在委內瑞拉的“徹底失敗”以及由此帶來的嚴重社會不公和貧困率大幅度上升，一定程度上促使宣導社會公正的左派領導人查韋斯在 1998 年 12 月大選中獲勝。此後他在有背景的軍事政變中遭到逮捕，主要靠來自貧民窟的廣大群眾面對政變槍口的奮勇鬥爭才能再度掌權。這個依靠平民發起街頭革命翻身的政治家由此成為新自由主義最堅定的批判者，認為西方國家宣導的新自由主義及金融全球化使拉美經濟的脆弱性、社會不公正和貧困日益嚴重。因此他主張通過建立“21 世紀社會主義”對資本主義制度進行替代。

委內瑞拉最具革命性的主要措施為：在政治上廣泛發動工農群眾構建底層民眾的參與式民主；在經濟上通過石油業國有化等加強國家對經濟主權及其收益的控制；以全球危機伴生的油價高企獲取溢價收益來加強財政投入於“內生發展”和社會建設，改善貧富差距和社會不公正狀況。進一步提出“美洲玻利瓦爾省替代”（ALBA）以加強拉美內部團結和一體化，轉變經濟發展模式，抗衡主導國家宣導的美洲自由貿易區（ALCA）。

進入新世紀以來，拉美其他左派政府相繼上臺並且提出類似改革方案，如玻利維亞的“社群社會主義”和厄瓜多爾的“21 世紀社會主義”。

2、委內瑞拉收回石油主權及其對國民福利的影響

1999 年，委內瑞拉全民公投通過了新憲法，其中第 12 條規定：所有存在於本國領土內、領土範圍內包括專屬經濟區和大陸架的海床下的礦產資源及碳氫化合物資源都是共和國的財產。這就使外國投資者無開採權而只是合資企業的一部分股票的持有者，有開採權的是合資企業，其中國家的股權持有率必須超過 50%。該法施行兩年後，石油開採地使用費從原先的 16% 提高到 30%。2005 年 4 月 12 日，石油部下令 PDVSA（委內瑞拉石油公司）的董事局修正所有有關碳氫化合物的條款並評估在一年內廢除這些條款的法律機制。2006 年 3 月 31 號，議會通過第 38410 號法案，規定了加入合資企業的條件和操作方式。2007 年 2 月 26 日開採奧里諾科重油帶合資企業法案（Decree-Law on Migration to Joint Ventures of the Association Agreements of the Orinoco Oil Belt）的頒佈是鞏固石油資源國家主權的一大步。委內瑞拉由此重新控制了石油工業的運作並增加了財政收入。

在石油主權回歸國家控制的大環境下，過去十年裡委內瑞拉的 GDP 呈不斷增長趨勢。政府很好地利用了增加的收入，投資在以下領域：基礎設施建設，交通，教育，醫療，體育活動設施及住房。失業率在下降，福利事業的支出在政府支出的百分比則在提高。同時，委內瑞拉在人類發展指數，基尼係數，貧困人口百分比都有很好的表現。具體表現在：

- 2009 年，成功地將貧困人口數目減半，達成一個聯合國千年發展目標。
- 教育：提高了小學、初中及高等院校的入學率。通過“羅賓遜項目”，在 2007 年消除了文盲，全國大學入學率在拉美國家中名列第二，全球名列第五。
- 醫療：政府在國民健康醫療方面投資巨大，成立了貧困社區基礎醫療中心，綜合治療中心，人民診所，拉美兒童心臟病治療醫院等等。
- 交通：在 3 個最大城市建造了 6 條地鐵線路；在 Orinoco 河上建了第二和第三座橋樑；又建設了兩條鐵路等等。
- 運動設施：07 年委內瑞拉成功舉辦了世界最古老的足球錦標賽——美洲杯，並為此建設了 9 個能各自容納 3 萬觀眾的足球場。
- 科技：成功發射了人造衛星。
- 電力設施：在 Caroni 河上建造了水電站，總計 25 億美元，全國電力系統增添了 2280 兆瓦。目前正在同一條河上建設 59 億美元的新水電站，到 2014 年產電 2000 兆瓦。

委內瑞拉成功地將石油收歸國有，完善了稅收政策。如果說國際石油公司僅僅是為了利潤在掠奪資源，那麼國有石油公司則是為了國家整體的可持續發展在做貢獻。從以上的數字和事實我們可以看到，委內瑞拉的石油產業已經成為促進國家及其人民發展的一大動力。

案例整理：薛翠 黃小媚

參閱：〈新興七國研究報告——委內瑞拉報告〉(www.emergingcountries.org)

資料來源：黃樂平，《新世紀以來拉美國家經濟改革道路的分化——以委內瑞拉和巴西為例》，<http://www.cssn.cn/news/512239.htm>；

王鵬，《對委內瑞拉可治理性危機的分析》

<http://ilas.cass.cn/u/wangpeng/%7B33A88F88-64F3-4B46-954D-83C29C91DF05%7D.pdf>

域代碼已更改

需要進一步加深理解的是：在全球金融資本危機 2008 年爆發、發達國家為了救市而製造的過剩流動性大規模沖入能源市場、造成能源價格暴漲期間，委內瑞拉恰好因在此之前就

已經把石油資源大部分收歸國有而得到了政府財政“搭便車”地佔有石油市場溢價收益的**歷史機會**——國家財政直接佔有增量石油收益，並由政府主導和資助全面推進“玻利瓦爾省運動”，動員成千上萬志願者深入貧困社區，開展“參與式”小型工商業的社區建設，形成民眾自我賦權的經濟條件。這就在政府增加對貧民窟的基本建設項目投資的同時，初步形成了社會性的自主經濟基礎。

可以認為，這個被西方輿論熱炒的“查韋斯革命”的實質，主要是借助政權更替從外國資本手中重新收回國家經濟主權，得以由國家佔有經濟資源及其收益用於本國的民生建設。這個經驗，客觀地佐證了我們關於發展中國家“主權外部性”問題的分析；不僅表明這種外部性可以通過具有民族民主革命意義的政治性措施予以改變，也同時讓人警覺到，任何收回經濟資源主權而內在地具有革命性的政治措施，都會客觀上引發那些跨國公司所在國的各種手段的對抗。

委內瑞拉經驗在發展中國家之中確有一定的特殊性；相對而言，上文介紹的南非在獲得政治主權的交易中失去國家對本國資源經濟控制權的經驗更具有普遍性。因此，這兩個國家的經驗構成進一步開展對比研究的條件。

通過以上案例比較我們還進一步認識到：

其一，發展中國家能否突破發展主義困境的關鍵，不僅在於民眾是否有能力改出西方中心主義的思想桎梏，而且在於政府是否有條件把資本與風險集中所導致的社會成本(外部性)，以內部化的方式轉移吸收。

其二，凡是在民族民主革命戰爭中獲得完整“革命紅利”、亦即國家經濟主權和政治主權的獨立國家，雖然沒有主權負外部性造成的困境，但勢必因無償沒收外部跨國資本和內部官僚資本的全部財產而遭遇前殖民地宗主國和流亡海外的政治集團的全面敵對！既然敵對，那麼任何客觀上的陰謀，主觀上就都是陽謀，並且毋庸置疑地被納入到科學、教育、文化等領域用於維護其政治正確，遂有冷戰和後冷戰延續至今的意識形態化的“軟實力”對抗。

然而，我們在以上案例研究中發現：發展中國家承擔知識生產責任的知識份子也是利益群體，因長期接受殖民主義教育和文化浸淫而得到宗主國收益的分享條件，這種軟實力控制已經到了積重難返程度；由此造成“精英被俘獲(elites being captured)”：任何被這種軟實力所困擾的發展中國家知識界的精英分子，都難以直視自己國家因主權外部性而身處發展陷阱無以自拔的事實。

如果發展中國家願意擺脫西方軟實力控制來看這個世界在二次大戰之後的真實經驗過程，就可以清晰地看到：世界上只在受到中國土地革命直接衝擊的“東亞社會”才有向所有農民平均分配土地的“強制性制度變遷”；而且，這種被中國土地革命紅利所波及或帶動的制度變遷，也都成為東亞各國相繼進入工業化的基本前提；無論這些國家信奉何種從西方舶來的主義或者是何種政治體制……

因此，重構對發展中國家真實困境的理性解讀，是我們肩負的重大歷史任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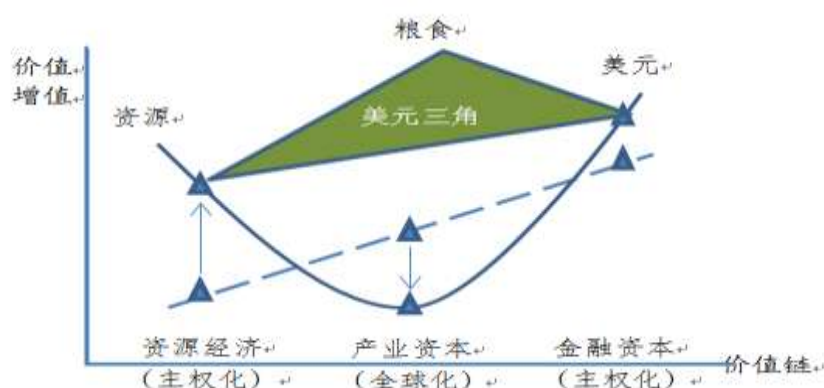
二、新時期幣緣戰略之下的“國家競爭微笑曲線”

縱觀資本主義全球化的發展歷史，在商業資本和產業資本階段，因資本同質性擴張而形成的地緣關係成為了殖民化時代國際關係的核心，其目標為對資源的地理縱深控制。自 20 世紀 70 年代以來，金融資本愈益成為世界分工和分配的核心，遂使貨幣權力超越地緣實力，成為金融資本主義時代國家間關係的新樞紐。

主宰金融資本全球化的核心國家自二戰後，已經形成制度權與話語權，遂得以把維護本國戰略利益並極大化獲得資本利潤回報的過程中產生的各種制度成本和引發的金融危機代價，直接轉嫁給發展中國家，同時也轉嫁給環境生態來承擔。

先進國家因為大量進口廉價商品而長期保持最低銀行利率，在其主導貨幣權條件下直接享有在本國低成本融資的競爭優勢，可以在發展中國家享受雙重收益。一方面是低融資利率投資到發展中國家得以佔有其高利率的息差；另一方面，投資國貨幣匯率不斷上升，迫使發展中國家更多支付本幣購買外匯還本付息。這些，都使得幣權國家的投資轉化的外債增加，投資人享有在發展中國家較高的投資回報率，具體表現為道瓊斯 500 工業股票指數長期居高不下。這有助於在主導國家資本市場上形成長期制度收益，吸引更多金融資本進入股市。

金融全球化的新幣緣政治格局內在地決定著佔有貨幣霸權的核心國家與產業國及資源出口國家之間的關係：貨幣霸權國透過巨額增發貨幣和債券信用來向原材料、能源和糧食市場轉嫁其債務，不僅坐享鑄幣稅，而造成全球戰略性商品價格上升，主要表現為能源（石油）及糧食價格上漲。本文用“國家競爭微笑曲線”來表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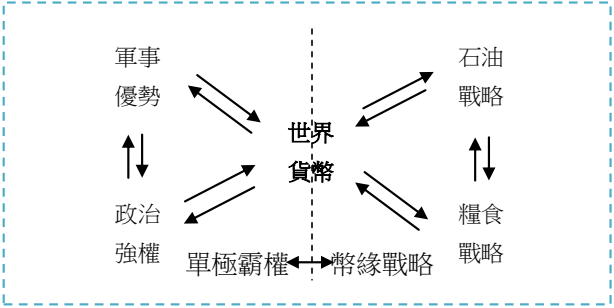
圖中的虛線是產業資本階段的傳統收益曲線；實線是金融資本階段的當代收益曲線。

在當代金融資本階段，資本積累、收益和分配的機制發生了重大變化，在金融資本市場投機性波動的侵蝕下，產業資本階段所強調的上下游銜接機制和企業的外部風險內部化功能被嚴重削弱，國際競爭格局亦隨之改變成了“微笑曲線”：在這條微笑曲線上，自然資源、金融資本位於附加值最高的兩端，形成兩個上翹著微笑的嘴角；而曾經作為各項資源、要素

的組織核心的產業資本，則位於附加值最低的嘴巴底部。

同期，擁有資源主權的國家，可以搭便車地更多佔有資源出口收益，用來進行社會再分配，降低其面對的風險係數，但同時面對幣權國的敵視，不僅遭國際主流意識形態喉舌通過種種軟實力而被妖魔化，並且有遭遇借巧實力實現軍事顛覆的危機。

而製造業為主的國家則要承受全球金融流動性增加造成輸入性通漲所導致的高利率和低匯率的雙重壓力：一方面在原材料價格上漲造成的生產成本和消費物價上漲壓力下，政府一般都會提高銀行利率，這就必然使本國投資品價格高於外國，失去與低利率外資競爭的可能性，遂以對外開放為名順水推舟地拱手讓出國內戰略產業；另一方面，外資大量流入促使本國貨幣供應被迫對沖增加，一方面製造通貨膨脹基礎，另一方面導致本國貨幣的兌換率下降，償付外債的匯率成本上升。因此，製造業為主的國家面對的風險係數最高。



用微笑曲線理論對本文三個案例做進一步分析，可知：全球危機之中的美國無論意識形態上怎樣與委內瑞拉對立，卻只能看著委內瑞拉憑藉石油資源的國家主權搭上美國增發貨幣的“便車”：美國越是大規模增發貨幣、流入能源市場推高石油價格，委內瑞拉國家財政得到的石油溢價收益越多、用於反貧困和拉美區域整合的投入越大。可見，處於金融資本階段世界貨幣的發行者美國對於以資源立國的委內瑞拉具有主權正外部性。但是，中國則同時承受著這兩個客觀具有“戰略互惠”作用國家的主權負外部性。這一切對於在獲取政治獨立的談判中失去資源主權的南非，則只能被跨國公司掌控其資源出口的溢價收益；本國經濟幾乎難有起色，政府對公眾的政治承諾就難以兌現，社會衝突也不斷爆發。

新幣緣政治下的當代全球化格局，已經成為束縛發展中國家的新發展陷阱。換言之，製造業國家在國際競爭中處於最不利的位置。在當前的金融全球化體系下，追求工業化來實現現代化發展的後發國家困難重重卻百思不得其解。

三、政策建議

綜上所述，美國的全球幣緣戰略體系，是以美元資本、能源（石油）、糧食三大霸權為核心的新霸權體系。“幣權”時代的特徵，即以地緣關係為保障、以決定產業鏈安全的資源定價權為基礎、以當代國家政治主權派生的信用體系以及自主的財政貨幣政策為核心，美元可以在全球經濟金融化競爭的資本擴張中獲取利益並轉嫁成本。

對此，不同發展中國家可以根據自身主權外部性分析形成不同應對戰略。

例如，南非應該努力完成至今未竟的民族民主革命的，積極引導國內被壓迫黑人群體已經奮起的對於跨國公司的強烈反抗，奪回金融經濟和資源經濟主權。

再如，委內瑞拉則需要考慮幣緣戰略及其巧實力另外一種運作的可能：美國能源進口下降帶動國際油價下跌，將會直接導致委內瑞拉石油出口收益下降，致使已經鋪開的主要依靠石油財政的國內反貧困項目和國際上推進的拉丁美洲整合計畫都面臨投入不足的威脅。

而中國作為世界最大實體經濟的發展中國家，亟需恢復本國貨幣的主權貨幣性質，以實體經濟為本來推進兩個方向的戰略調整：

其一是國內政策上加強內部整合，要利用“集中力量辦大事”的政治條件和長期形成的城鄉二元結構體制條件來貫徹“從資本文明階段向生態文明過渡”的國家意志；其中關鍵，在於把產業縱向一體化戰略、區域生態化綜合開發戰略和“新民主主義”戰略這三大戰略綜合起來，統籌協調，全面拓展國內已經過剩的產業資本和金融資本的投資和長期發展空間。

其二是國外政策上不以中國近代史上屢戰屢敗的海權競爭為方向，而是以向無敗績的陸權競爭為對外戰略思想的基礎，利用中國結構完整的產業資本內在具有的縱向整合規律，西去中南亞、西亞和北非，綜合性和開發性地推進有利於復興國家主權的基本建設及有利於復興社會民生的配套投資，從而形成構建本國幣緣戰略安全的外部條件，據此構建大陸型國家帶動周邊區域發展的陸域戰略縱深。